

曾

曾敏之之卷

第一辑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一辑

曾敏之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一辑)

曾敏之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2,000 印张：5.25 印数：1—10,300

书号：10456·174 定价：0.95元

湘艺：86—11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晁错之错	3
谈家书	5
不要作东郭先生	9
为有黄花晚节香	11
“疑似”可古为今用	13
谈重典	15
林孔湘预留遗书	17
数典忘祖的谬论	19
铸鼎、守法及其他	21
尊师与念旧	25
谈栽花	27
谈知人论世	30
“悦口”的艺术	33
封建余音	36
去桎梏·订法规	38
《送穷文》与《致富报》	40
改史·毁誉之间	42
谈“安贫乐道”	44
从胡林翼说起	47

自学热礼赞	50
从“未成四化英雄老”想到的	52
法治·“护官符”	55
谈《对贤良策》	57
明白人与诸葛亮	60
“萧规曹随”有新义	63
不能“费厄泼赖”	65
审势用典的一例	67
友情正义俱不朽	69
九方皋相马术	72
望云楼随笔	74
在毁誉的背后	79
逆取顺守与文治	81
刹住“未衰先老”之风	83
兴学一议	86
功成身退与选贤任能	88
何妨“炳烛”以学	90
贫富观	93
别开生面庆生辰	96
“犬耕”释义	98
离乱之中见真诚	101
谈师道	103
尊重三师	106
巴金先生的旷达	108

读书与欺世盗名	111
“文章信口雌黄易”	114
审美与景观	117
吴祖光的自嘲诗	120
“官艺”古今谈	122
嗜好与闲情	125
鲁迅讽风派文人	127
“应该退了”，退非其时	130
集体退休，千秋佳话	133
“睥睨天地之间”的政治家	136
刀下留情的呼声	139
谈选贤	141
谈中庸	144
“严师出高徒”一例	148
“成熟”的标志	150
谈增	153
“遗嘱”及其他	156
史笔的标准	158
编者后记	161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

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晁错之错

读史，对汉景帝时代的谋士晁错以悲剧结局颇为感慨，这似可列为鉴古的史训之一。

汉景帝时代，各地封藩的封建割据势力日盛，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晁错以御史大夫出谋献策，向景帝建议削弱各封藩国的封地，抑制各地封建势力的扩张。景帝采纳了晁错之策，为国家统一行长治久安之计。这件事本来是好事，在当时也曾获得朝廷有识之士的拥护。但是这一决策侵削了封建特权者的利益，于是有吴、楚七国之变。他们以“清君侧”为名，联合起兵反抗中央。景帝急商于群臣，决定以周亚夫为统帅，发兵讨伐叛逆。在这样形势之下，晁错本应和周亚夫联袂出征，为国平乱。可是他却畏首畏尾，反而建议景帝御驾亲征，他自己却躲在京都静候事态的发展。后来，给谗臣以可乘之机，在袁盎进谗之下，景帝终于动摇，改变了削藩的主意，并把责任推到晁错的身上，把他斩于东市，以缓和吴楚七国的反抗。

晁错这个智囊人物因此招致了悲剧的下场。

千古以来，凡评论到晁错这个人时，都认为他属于“君子之患，莫患乎勇于自信，而不能屈己以成国家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而辄败”。

这是说，晁错认识到封建诸藩的特权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威胁中央的集权，建议削藩，不失为明智之举。照理，既然了解此举必然引起吴楚诸国的不满，就应当趁景帝授权信任，以坚定的决心，采取积极的对策分掌军符，与周亚夫并肩讨伐，争取削藩的胜利。他如果这样做，就是既可保身也可保国，把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之实施。可扼腕的是，晁错却不是这样做，只知献策，却怯于负责，不能以实力为后盾，镇压反对势力，实现自己正确的主张，终于“功可垂成而辄败”。

晁错的失败，不能不令人深思。谈改革，凡触及有特权的势力，就不能妥协畏缩，只有勇往直前，采取针锋相对的有效决策，才有可能保证改革获得胜利。否则就会半途而废，贻祸自己，也贻祸国家。

（《南方周末》1982年2月5日）

谈家书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长，家庭本位观念也重，因而自古以来都重视家书。乱离中骨肉分散，音讯难通，存亡莫卜，固然盼望获得一纸家书，以纾解愁念，所以杜甫用两句诗概括了家书的价值：“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是在和平的日子里，家书也很重要，它是教育子女的一种形式，其效果不下于学校教育，因为家书的内容是谈家常，较亲切，直抒胸臆，不打官腔，所以易为接受。

家书虽然是一种不公开的私人信札，但是有心人却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依据，并传于世，藉以证明自己的人格胸襟。例如郑板桥的《家书》就属于这一类。颜之推的《家训》，本来是训勉子弟治家立身的训条，但是他以二十篇刻印行世，其口吻，也与家书无异。这都是见于历史记载的家书，作为封建道德教育，自有其深远意义，尤其是《颜氏家训》，中间所包含的人生哲理，直到今天仍有它的价值。

对于流传下来的家书，我认为刘向写的《诫子歆书》也值得研究。刘向是西汉时代的经学家、文学

家，他在这篇《诫子歆书》中，具有明确的辩证观点，这家书不过两百字，但是却提出做人做事最宜遵守的一条戒律。他对子歆说：“董大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惊，惊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之而来”。

刘向说的话，如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一个人经历忧患与不幸，会有亲朋登门慰问，但是忧患不幸常可成为对一个人谨慎恐惧，勤备向上的转变契机，从而向好的成功方面转化，当他因此而取得了成就，亲友们就又登门祝贺了。可是刘向更强调另一方面：“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常因成功而骄奢，一骄奢就会导致祸患，失败也会跟着来，如是“吊者”也随着来了。刘向还引证春秋时代一个典故，说齐国的齐顷公，一度国强称霸，藉霸者的威力，轻侮诸侯，终于被晋国的郤克战败于鞍的地方，化装逃亡，兵败师破，几至一筹莫展。由于醒悟过来，革骄戒奢，决心自励，取得了人民的信赖，才又逐渐强大起来，令诸侯归还了夺去晋国的地方，于是又“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了。

刘向的谆谆教导，是要子弟“战战栗栗”以看待人对事的关系，要渗透祸福互相倚伏的关系，然后立身处世才不至走向极端。

另有一种家书，也以告诫子弟为内容，但多偏于

世俗常规，无非勉励善守祖业，勤奋持家，重振家风，以衍世德之类。在封建时代，家书的形式与内容大体相近。只有到了当代，卓识之士，对教育子女的家书才展现崭新的内容。在这里不妨提出作家老舍写于一九四二年的一封家书来欣赏，他在家书中谈到儿女的问题，认为“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写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则成为废物，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

这封家书写于四十年代初，反映了老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可是不同凡俗的思想是多么值得赞美啊！这与鲁迅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可以媲美。卓越的作家必然是思想家，鲁迅与老舍在教育子女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一种新型的榜样，而他们的儿女也实践了父志，并不追求做官或做空头的什么家！

最近读到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傅雷家书》，其中所孕育的智慧、人生的哲理与伦理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儿子傅聪从家书中所受到的“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的教诲，终于

成了傅聪奉行的热爱祖国的准则，虽然在异国寄迹二十多年，终于鸟倦知还，并对培养祖国音乐人才作出贡献，不是可喜的证明吗？

（《南方日报》1982年12月3日）

不要做东郭先生

最近有一个动向值得注意：“文革”中为非作歹、迫害干部的杀人犯如广西的胥明德已难逃法网，被捕法办；如河北内丘的尹兴奎虽然已沐猴而冠，升为县委副书记，也已依法逮捕。

这是清查“三种人”所取得的新突破。

根据查清这些罪犯所获得的罪证，有令人大吃一惊的特点，其特点是：

一、“三种人”为了掩盖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莫不摇身一变，变为来历清白，档案中已泯除了一切劣迹，然后以善于投机钻营，伪装积极的手段再度骗取信任，攫取权位，胥明德是一个典型；

二、“三种人”以伪装术继续掌权，派性不改，照样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更以弄虚作假的手段，取得上级重用，于是形成了一种潜伏势力，待机而动，尹兴奎是一个典型；

三、“三种人”在“文革”中曾以造反起家，以派性维护过一些老干部，后来这些老干部复出了。当权了，由于丧失原则，就又以派性卵翼“三种人”，

于是造成有利于“三种人”潜下来，积聚力量。

正因为“三种人”具有上述各种特点，要彻底清查并非易事，如果有关领导部门麻痹、松懈、温情、胡涂；领导干部失于明察，昏昏然被他们吹捧抬轿，就有留下祸根的危险！

如今，在全国范围调整机构，选拔人才，建立各级领导的梯队，要以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作为选拔标准，这是好事。但这样做还不够，一定要下决心，以彻底清查“三种人”作为配合行动，把伪装、潜伏、隐瞒罪恶历史、藉某种权势以混入新选拔队伍之中的胥明德、尹兴奎之流查出来加以惩处，才可能杜绝后患，才可能保证正确的路线、政策得以持续下去。

不能低估“三种人”的潜能，不可做“东郭先生”。王洪文曾狂呼过“十年后再见”的口号。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四化建设，必须根绝“文革”乱源，使“江东子弟”失却一切“卷土重来”的基地。

（香港《文汇报》1983年5月20日）

为有黄花晚节香

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这是一句俗话，意在知人论世要具有辩证观点，不要为成见所囿，是很有道理的。

最近有人在写《杨度外传》，就提供“不要把人看扁了”的论据。

杨度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被人称为“旷代逸才”，一度逃避清廷迫害而亡命日本，一度受袁世凯的赏识做过高官，一度与军阀曹锟、张宗昌交往甚密，一度作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入幕之宾……，够了，单看这一连串的经历，就可断定他非善类了。

谁也料不到就是这个杨度，在上海白色恐怖年代，竟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掩护了革命活动，受到周恩来的器重，直到周恩来病重垂危之时，特别叮嘱《辞海》编辑部：如写到杨度其人时，别忘记写上他晚年参加中共这一条。接着，有夏衍、王冶秋写追忆杨度往事的文章，以不可移易的事实证明杨度是当年的地下党员，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